

就《“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证伪》一文对蔡天新回复的回复

刘合国

（海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 2026年《数学文化》第一期刊发了笔者文章“‘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证伪”，缜密论证了浙江大学蔡天新教授发明的“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之说纯属自欺欺人。该杂志同时刊发了蔡天新的回复，他自认“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之说系从杨国选处得来，他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没有注明只是他的“失误”，并且他认为笔者不该质疑他而应该去质疑杨国选。本文以蔡天新的文字为依据，以现有的事实真相为准绳，着力还原他在道古桥闹剧里的本来面目，得到三条肯定性结论：

一、“‘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证伪”一文在逻辑和行文等方面是无懈可击的，把蔡天新判定为“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之说的发明人是经得起事实检验的；

二、尽管杨国选臆想的成果“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及其史料来源错误百出，根本不值一驳，但蔡天新在2011年知道该成果后，利令智昏，处心积虑地进行了剽窃包装，强行据为己有，在世上留下了一个荒唐透顶的笑话；

三、十几年来，蔡天新以“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之说招摇过市，利用各种资源兜售他守护道古桥的形象，公然欺骗政府欺骗民众，攫取了种种名不副实的声名和荣誉，甚至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教学成果奖。

关键词 秦九韶；道古桥；蔡天新；剽窃；杨国选

多年前笔者翻看浙江大学蔡天新教授（以下简称“蔡”）所著《数学传奇》里的文章“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才读至蔡引用的史料“南宋咸淳初年《临安志》有载：‘西溪桥’，本府试院东，宋代嘉熙年间道古建造”时，立即意识到该史料属于凭空杜撰之类，绝无出现在《临安志》之类志书的可能，该文也就归于虚妄浅薄一类，不过笔者根本没想深究，只是一笑置之。此后友朋知己之间偶尔谈及蔡的多才多艺，特别是其“左手数学，右手诗歌”之类在俗世令人头晕目眩的巨大光环，笔者只是应景讽刺挖苦几句，以期引起警惕而已。笔者一介书生，身无长物，几近机盲，于微博、朋友圈之类一概不沾，唯“好读书，不求甚解”始终如一，也素来信服清代理学大家唐鉴的处世格言“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求在书斋的青灯白壁陪伴下萧然悠然地度过求知学者的一生。

去年受一次偶然因缘激发，笔者决定撰文揭发蔡的标志性成就“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之说完全虚妄无根，就利用各种资源进行了材料搜索，其中朋友们

在收集资料方面提供了不少帮助。笔者梳理阅读后大吃一惊：蔡竟然凭借这种无中生有的歪门邪说，欺骗政府欺骗民众，在江湖上混得风生水起轰轰烈烈，影响远远超出了数学之外，招致的热烈追捧已经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其所作所为完全突破了笔者的想象力。这实属中国学界的丑闻，估计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最大丑闻之一。实事求是地说，笔者在撰写文章[1]时，心情非常激动非常愤怒，最初拟定的文章题目是“‘秦九韶设计杭州道古桥’之说纯属自欺欺人”，准备按照 10 个小节撰写：横空出世、幸焉？不幸焉？、临安三志、梦梁录、“道姑桥”考、漫话“西溪”、“西溪桥”考、李心传和朱世杰、释“道古”、结论。可惜笔者道行实在太浅，内功修为实在太低，写作时一直无法控制内心的那种厌恶之感，只能在痛苦挣扎中草草地写完 3 个小节完事，离预定的写作目标相差甚远，这种经历是笔者从未有过的。文章投给《数学文化》后，编辑部认为言辞有碍观瞻，使劲抽去了文章的几根骨头，刊出了现在这篇四平八稳的所谓学术文章[1]。在内心深处，笔者非常感谢《数学文化》编辑部的辛勤劳作，在《数学文化》上刊登这篇文章需要道德勇气：维护真理，绝不屈服于世俗。在滚滚红尘中，道德勇气是异常稀缺的精神资源！

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读书人之无知无识、卑劣齷齪、毫无原则、毫无底线，那是不难耳闻目见的。最可笑的是，一些所谓的读书人明明缺乏最起码的勇气，根本不敢直面邪恶，却时时装出一副公正状，要搞什么“费厄泼赖”之类，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在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非常精到地刻画了这些人的嘴脸：“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民国时期的读书人虽然不少奉行调和主义，主张“费厄泼赖”，但他们都凭借真实学问立足，有硬邦邦的学术功业，现在呢？

蔡一直是《数学文化》的编委，能够及时预览《数学文化》的文章，他在看到笔者的文章[1]后，写下了回复[2]，[1]和[2]是相邻着在《数学文化》同时刊出的。需要指出的是，[2]脱胎于蔡在 2025 年 12 月 17 日写给《数学文化》两位主编的信（见附录 1）以及他在 2026 年 2 月 24 日发出的与[2]同名的微博，一位朋友把该微博转给了笔者。在这三篇一脉相承的文字里，蔡径直承认其标志性成就“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剽窃自四川省安岳县宣传部的一个业余学者杨国选。蔡身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这也许是浙江大学最高等级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数论学家，诗人、作家，竟能够放下身段去做如此苟且下贱之事，真是奇哉怪哉，实属天下奇闻。为方便计，本文把蔡的信、微博、文章[2]依次简称为奇文（I）、（II）、（III），统称它们为“奇文三部曲”。这些文字破绽百出，最真实地暴露了蔡混乱的思维逻辑和令人鄙视的谎话连篇，是十足的贻笑大方之作。奇文（II）（III）基本上是一致的，蔡在奇文（II）的评论区率先写出如此丢人现眼的下流文字：

如果有微友看到刘合国的文章，只要看看后面的作者头像，就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十足的人身攻击，充分暴露了蔡内心的阴暗和卑劣！古语云：是可忍，孰不可忍？！古语又云：来而不往，非礼也。笔者绝不会软绵绵地要求蔡道歉，只会牢记鲁迅先生要“痛打落水狗”的教诲，更加坚定更加努力地继续战斗。现在笔者就要以蔡的文字为依据，以现有的事实真相为准绳，着力还原蔡在“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闹剧里的丑陋行径，以笔为刀强力解剖蔡的灵魂，揭开其光鲜外表下令人唾弃的肮脏面目，为被他误导蒙蔽的政府和世人讨个公道，也期望能够警惕世人：对那些招摇撞骗的伪读书人要多存戒心，遇事要讲究逻辑，要根据逻辑作出判断，不能轻易盲信盲从，也不能太过宽仁。

笔者素来钟爱中国剩余定理，把它视为最基本最深刻的数学原理之一，多年前就在为撰写《中国剩余定理》一书准备资料长编。笔者虽然鄙视秦九韶的品行，但还是非常重视并收集有关秦九韶的材料。去年为了揭发蔡学术造假，笔者强忍脾性读完了“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之第一节。今年初在三亚参加会议期间看到朋友发来的一个视频“蔡天新：左手数学，右手诗歌”，感觉非常浮浅可笑，回到海口后，强压满腔怒火又读完了“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之第五节，孰知这为撰写现在这篇文章提供了部分绝佳素材，真是功不唐捐。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既是一篇严肃的学术论文，也是一篇紧随[1、2]进行短兵相接的论战文字，为论证严谨和方便阅读，在材料征引和行文方面不可避免地有[1]有些重叠。

开场之前，笔者先纠正蔡的两处常识性错误。

其一，不管是引自他人还是自创，蔡在[2]里的用语“南宋末年学者潜说友续撰的《咸淳临安志》后八十五卷”就是一个笑话。

笔者在[1]里已经交代得非常清楚，在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中，《乾道临安志》是现存最早系统记载南宋都城临安的官方志书，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八明确记载：“临安志十五卷 府帅吴兴周淙彦广撰”，现残存三卷。《淳祐临安志》原书卷数不详，今残存五卷至十卷。《咸淳临安志》乃潜说友知临安府时所修，他序《咸淳临安志》云：“暇日视故府，阅郡乘，或病其漏且舛，乃葺而正之，增而益之。凡为图，为表，为志，总百卷。”《咸淳临安志》后出转精，肯定吸取了《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的长处，但望文生义地以为《咸淳临安志》是在《乾道临安志》之后再“续撰”了八十五卷，那是十足的无知，从残存的临安三志都详细记载了临安的桥梁即知其非，“续撰”一词可笑至极。

“南宋末年学者”肯定不是学术界对潜说友的通用称谓，估计是蔡别出心裁的独创，纯属无知和哗众取宠。

其二，不管是引自他人还是自创，蔡在[2]里的用语“元大德十年《临安志》”也是一个笑话，这个世界从来就不存在这部书。

临安是南宋时期杭州的府名，是南宋的专有称呼。元朝攻陷临安后，就把临安改为杭州。在元朝修杭州志，不管是翻刻还是重修，要是用“临安志”作为书名，那可是要冒被杀头的风险的。不管是谁，即使翻遍杭州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的 14 册《宋元浙江方志集成》，肯定找不到“元大德十年《临安志》”，就是把范围扩大，翻遍《四库全书》电子版，查遍各类数据库，搜遍各个学术网，也是如此。

蔡在奇文（I）写道：“文章发表前，我去查找过有关文献，遗憾没有查到，心里惦记着，也是我写过的文章中唯一让我记挂的一件事。”这份表白证明：最迟从 2013 年开始，蔡就在查找《临安志》，十几年下来，他竟然还没有弄清《咸淳临安志》的最基本信息，即使在看到[1]之后还要重犯如此常识性错误，真令人惊心动魄地惊诧啊！

蔡以如此低劣的阅能力和治学功夫去研究秦九韶，实在是勉为其难，不时搞出常识性笑话应该是顺理成章极其自然的事。他在[2]里还质疑笔者：

杨文提到道古桥的来历出自南宋末年学者潜说友续撰的《咸淳临安志》后八十五卷和元大德十年刻的《临安志》：“道古桥，本府试院东，西溪河上。”“宋嘉熙年间‘道古’建造，名曰‘西溪桥’。元人朱世杰为纪念建桥人‘道古’，将‘西溪桥’更名‘道古桥’，并书镌桥头。”刘文虽也引用杨著，但似乎通篇未提《咸淳临安志》后八十五卷，也未对杨文有关《大德临安志》的引文有所质疑。杨文提到“宋嘉熙年间道古造”引自《大德临安志》，被本人错记成《咸淳临安志》，引发刘教授一番点评。刘文尚有多处值得商榷。

无知者确实无畏啊！

面对蔡的这般质疑，笔者啼笑皆非，唯有借用先贤的话来进行回应，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从纯粹的道德修养而言，笔者也信奉先贤的中庸之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但尘世儿女，各有天命，笔者也许就是那个被命运挑中的小孩，说清了蔡在道古桥闹剧里一直在裸奔。现在笔者要进场论战了，不由得想起《后汉书·杜密传》里杜密跟颍川太守王昱谈话时，振聋发聩地点评刘胜：“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这才是先哲的血性和精神！

一、铁证如山

面对[1]的缜密论证，蔡显然毫无还手之力，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他白底黑

字地承认：“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剽窃自杨国选的调查考证，他在随笔文章“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没有注明，这只是他的“失误”。这个“失误”竟然延续了十几年！蔡企图以此轻巧地蒙混过关，不过这肯定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留下的文字图片俱在，他守护道古桥的光辉形象俱在，这是谁都不能改变的。他以剽窃得来的虚假成果博得赫赫声名，享尽滚滚红利，现在却想一走了之，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自古因果相循，报应不爽，天道不可违。自2011年得知杨国选的这个调查考证起，蔡在“道古桥”闹剧上的表演就像柳宗元寓言小说《蝜蝂传》（见附录2）里的那只小虫蝜蝂，贪得无厌，不知死活。现在他主动背上的锅实在太大大沉了，想轻飘飘地把锅甩给杨国选是不容易的，况且他也不可能具备甩出去的能力。在现存的事实真相面前，蔡的任何辩解都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2012年4月28日《浙江日报》刊发“西湖新添‘道古桥’景点”的新闻，报道杭州“道古桥”揭牌仪式，全文根本不见杨国选的名字，专门地突出蔡在“道古桥”闹剧上的开创之功：

此桥由浙大教授蔡天新提议命名，桥名由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王元先生题写，碑文记载了道古桥的历史。道古桥由南宋大数学家、闻名中外的中国剩余定理发现者秦九韶亲自设计。

《上海日报》的两名英文版记者徐雯雯和俞宁（据[3]P₁₂₅）就“道古桥”揭牌仪式之事在2013年《数学文化》发表图文并茂的文章“跨越千年的数学桥”[4]，蔡的多张照片赫然在列，全文当然没有杨国选的踪影。虽说这篇文章完全是一篇应景之作，但它对澄清道古桥闹剧的真相具有异常重要的价值，文章断然声称：

当地居民对这座石桥的历史几乎无人知晓，直到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揭开了这一段尘封的记忆。

只要具备基本的汉语阅读能力，就能从这句话推出确凿无疑的结论：是蔡发明了“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而不是别人，当然也不是杨国选。

蔡绝对是清楚并且认可这个肯定表述的。[4]非常例外地用中、英两种文字对照撰写，内中的英文文字发表在《Notices of the AMS》（即文献[5]），文中总共插入了三张照片：一张显示了王元院士题写的“道古桥”三个字的道古桥照片、一张蔡与唐孝威院士的合影、一张包括蔡在内的多人合影，这些照片均与蔡密切相关，于此衬托出蔡在揭牌一事上的显耀地位。[5]如实翻译《数学文化》上的那句中文表达：

The stone bridge's history was known by few modern people, until Cai Tianxin, a mathematics professor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uncovered its dust-laden secrets.

这篇英文文章随后非常及时非常醒目地出现在《数学传奇》之“再版序言”

里，这绝对是蔡自己的文字：

部分篇目被译成五六种文字，先后发表在《美国数学学会会刊》（Notices of Amer. Math. Soc.）等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蔡的操作有如行云流水，衔接处严丝合缝，虽然令人叹为观止，但是也留下了不可撼动的如山铁证，这肯定是蔡不能预料到的。几乎可以肯定地说，[4、5]跟蔡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而跟杨国选则毫无关系。现在蔡一心想着甩锅给杨国选，只不过是又一次自欺欺人罢了。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蔡发明“秦九韶造桥”这个惊天传说后，就在很多公开场合努力宣扬他的发明，并不断强化他守护道古桥的光辉形象。久而久之估计他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再也不会反思他的发明本身就是靠剽窃得来的空中楼阁，他把剽窃、自信、自是、自用、自恋以及自欺欺人发挥到了极致，开创了中国数学界的一个恶劣先例，他的所作所为在中国数学史上是前所未闻的。

2014年8月22日《文汇报》在《文汇报·焦点》版刊发一篇文章，宣扬蔡守护道古桥的光辉事迹：

听过蔡天新讲课的学生，都会记住“秦九韶”这位南宋大数学家的名字，有人甚至还会专门去杭州天目山路上的道古桥去“朝圣”。小巧精致的道古桥，是秦九韶亲自设计的，“道古”两字正是秦九韶的字号。

到了当代，蔡天新却成了秦九韶的另一个“守护者”。原来，进入本世纪后，架在杭州西溪河上的道古桥难逃拆迁命运，当地的一项市政建设工程上马，导致桥毁河填，只保留了道古桥公交车站名称。

2012年，在蔡天新的建议下，杭州市地名办和民政局将距老桥遗址百米的一座新桥命名为道古桥。桥头还树了一块石碑，由中科院院士、数学家王元先生题写了桥名。

2021年7月6日，蔡在《赛先生》上再次发表“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这篇文章是一位朋友转来的）一文，并且特别注明“原创”，这两个字“原创”是蔡无法否认的，它对澄清真相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2021年7月30日《解放日报》在《解放周末·对话》版刊发对话文章，进一步宣扬并强化蔡守护道古桥的动人形象：

解放周末：据说，您曾“守护”了与秦九韶颇有渊源的道古桥？

蔡天新：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上原有一座石桥，叫道古桥。道古是秦九韶的字，据南宋咸淳初年《临安志》，造桥者是秦九韶。后因西溪路扩建改造，原先的桥和溪流成了平地。我在那儿附近住了很多年，后来看到在距道古桥原址约百米处建了一座新桥，我便提议，给这座桥重新命名为“道古桥”，并酌情在桥头

设立一块石碑。此建议后来被杭州市政府采纳，我请数学家王元先生题写了桥名。英国剑桥的数学桥，相传由牛顿设计，是游人的必游之地。所以我特别高兴，在历史文化名城杭州，现在也有了一处科学人文景观。

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只要读过蔡的上述事迹，稍加思考就能够得出明白无误的结论：蔡就是“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的发明人，完全当之无愧。从这些报道来看，“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肯定也是蔡非常看重非常珍惜非常引以为傲的标志性成就，现在他要把这项巨大荣誉拱手让给他从不提及的杨国选，这种过人风范实在令人瞠目结舌！鲁迅先生把那种无线索可寻就改变其主张的人称为流氓，这个观察是深刻的。

蔡在奇文（I）里说：“（杨国选的文章）当时挂在网上，并在有关会议上宣读，还是友人在 2011 年前后告诉我的。”这个世上除了蔡自己和蔡的那位朋友，大概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蔡的发明“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其实是剽窃自杨国选的，这肯定是蔡的私家秘密，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不会也绝对不能公之于世的。蔡刻意隐藏了他的材料来源，用实际行动重新诠释了一句古语：大匠不示人以璞。现在“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的谎言被彻底揭穿了，蔡就要推卸责任，甩锅给杨国选，实在是有些一厢情愿，只能给世人再添一幕掩耳盗铃的现代版滑稽剧。

一个毫无操守的软体动物！

笔者见识短浅，与蔡素未谋面，也无缘见识杨国选，只能凭借蔡的文字和事迹判断出蔡独自发明了“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实在觉悟不到蔡的发明其实是剽窃自杨国选的。笔者辜负了蔡的高估，真是罪过！尽管带有想象猜测的成分，但笔者[1]结尾处的行文在认知上是立得住的：

也许当年蔡天新教授漫步杭州街头经过道古桥时，突然联想起秦九韶的字就是“道古”，他可能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激动不已，在主观愿望的引导下把道古桥与秦九韶和朱世杰进行了捆绑，曲解和改变了史实，让错误流播四方甚至波及海外。

蔡也实在是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质疑这段表述的，他在《数学传奇》之“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里有段文字，内中“突发奇想”一语与笔者的上述文字“突然联想”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2005 年，道古桥附近天目山路（杭州东西主干道）南侧西溪支流沿山河上修建了一座人行石桥（在杭大路的马登桥和黄龙路的沿山河桥之间，离道古桥原址约百米左右，比原先的长且宽阔）。笔者曾数度实地勘察，此桥跨河而建，两岸垂柳披挂，风景优美，且闹中取静，关键是尚未命名，故而突发奇想，建议将其命名为道古桥。

还有，他在《赛先生》上再次发表的“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一文也有相同的表述：

2005年，道古桥附近天目山路（杭州东西主干道）南侧西溪支流沿山河上修建了一座人行石桥（在杭大路的马登桥和黄龙路的沿山河桥之间，离道古桥原址约百米左右，比原先的长且宽阔）。我曾数度实地勘察，发现此桥跨河而建，两岸垂柳披挂，风景优美，且闹中取静，关键是尚未命名，故而引导我突发奇想。

蔡的这两段文字是一位治学非常严谨的小友提醒笔者的，他说蔡既然自己说出“突发奇想”之语，那就不应该质疑笔者的文字。蔡自己“突发奇想，建议将其命名为道古桥”，不知他为何要在奇文（II）里以抱怨笔者的情绪写出“（何来笔者‘经过道古桥时突然联想……’？）”：

关于杭州道古桥的来历是秦九韶故乡、四川省安岳县委宣传部杨国选部长于2004年考证的，他在湖州参加了第三届秦九韶学术研讨会以后来杭州调研。他的文章题目是《道古桥的寻访与考究》，此文挂在网上多年，数学史界和数学界许多同行已看到，我写秦九韶文章时尚未正式发表，而且我的文章是作为科普随笔写于2012年春天，故而未有注明出处（这是我的失误），该文现以《宋元两大数学家与临安道古桥》为题略作修改正式发表于杨国选著作《秦九韶生平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想必川大方面也已审核，文章开头提到作者是2004年亲自来杭州考证的，而拙文《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写于2012年5月。杨文也提到了，他于2010年10月致信浙江省人民政府，建议将原道古桥附近的一座桥梁复命名为道古桥，也是在拙文写作和笔者建议两年之前（何来笔者“经过道古桥时突然联想……”？）。

蔡真是强人所难，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不顾逻辑了。直到撰写[1]时，笔者没有读到过蔡任何一句提及杨国选的文字，面对“直到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揭开了这一段尘封的记忆”这么肯定这么强势的语句（现在又知道了蔡在《赛先生》里的“原创”声明），笔者绝对不敢说是杨国选在蔡之前发现了“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从[1]之第三部分“不利影响”可以看出，笔者认为是杨国选受了蔡的影响，这是逻辑推理使然：杨国选在[3]里并没有断言他是发现“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的第一人。反过来说，要是秦九韶确实修建了杭州道古桥，而笔者在[1]里把“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的发明权归功于杨国选，那蔡会是什么反应，他一定会跳脚指责笔者有眼不识泰山：海南大学刘合国教授竟然读不懂“直到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揭开了这一段尘封的记忆”这么浅白的话，竟然不懂《赛先生》文章里的“原创”二字的含义！

再说，杨国选[3]P₁₁₈如此记载其史料来源：

《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西溪桥，本府试院东。”

元《大德临安志》卷一十五：“道古桥，本府试院东，西溪河之上。”宋嘉熙年间“道古”建造，名曰“西溪桥”。

杨国选的第一条史料是似是而非的：根据[1]知《咸淳临安志》卷之二十一的确记载为“道姑桥 本府试院东”，绝非什么“西溪桥，本府试院东”，这里杨国选明显篡改了史料。杨国选的第二条史料是伪造的：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元《大德临安志》”这部志书。而蔡的史料来源则为：

南宋咸淳初年《临安志》有载：“‘西溪桥’，本府试院东，宋代嘉熙年间道古建造。”

就文字表达而言，蔡的史料来源与杨国选具有显著的差异。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严谨的学者肯定不能根据这些文字做出肯定判断：蔡的史料来源出自杨国选，只是蔡“错记”了杨国选的材料。现在蔡轻飘飘地自称“错记”了，这绝对是一句脱口而出的谎言！从轻而言，如此重要的史料，蔡竟然不加考证，竟然能够凭借“错记”的史料立论，本身就足够荒唐可笑。从重而言，根据文字对比，蔡剽窃了杨国选伪造的史料，进行了刻意包装，这是十足的剽窃行为。蔡还在奇文（II）（III）里分别说：

故而海南大学刘合国教授的证伪应该针对杨国选先生（他尚健在），至少需要提及本人关于道古桥的来历引自杨文。

刘文也引用了杨著，故而知晓内情的他的证伪应针对尚健在的杨老，至少应提及拙文有关道古桥的来历引自杨文，而非像刘文所写那样杨文受我影响。

真是昏了头啊，蔡从不提及杨国选，却要求笔者写明他的伟大发明“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引自杨国选！现在，蔡已经三度承认其“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之说系从杨国选处剽窃而来，但面对白底黑字“直到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揭开了这一段尘封的记忆”“原创”，他绝对是无法用什么“这是我的失误”来自圆其说的。蔡算尽机关，看似进退从容游刃有余，但以他的学养和修为肯定悟不到最关键的天道，他忽略了真相的力量，他也根本不懂真相的力量。在事实真相面前，蔡那种鸡肠小肚的算计肯定是不堪一击、注定要沦为笑柄的！

必须承认，蔡确实不是一个糊涂人，确实是有些小心眼小伎俩的，他阅读[1]后就明白他借以立足的核心史料出了大问题，于是立刻甩锅给杨国选，同时他也判断出笔者“知晓内情”。确实，去年笔者撰文时，根据已有的文字能够猜测到道古桥闹剧的前因后果，已经猜测到蔡把杨国选制造的狗屎当作宝贝牢牢地抱在怀里据为己有，但那终归只能属于猜测之类，[1]的行文在逻辑和事实上是无懈可击的。

二、自认剽窃

限于笔者见闻，根据蔡有据可查的文字记录，在 2025 年 12 月 17 日之前，他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从来不提杨国选的名字，好像他一点也不知道杨国选一直在收集有关秦九韶的传闻事迹，这根本不是蔡的什么失误，而是他刻意为之，是他深思熟虑之后必然要采取的举动。在蔡的奇文三部曲里，他已经三度明确承认是杨国选（不是蔡自己！）经过考证得到了“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他是从杨国选那里剽窃了这个发现，蔡留下的文字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证据。鲁迅先生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笔者把蔡的坦白看作是他在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下吐出的真言。蔡言辞确凿地在奇文三部曲里公开承认：

关于道古桥及其来历，出自安岳县委宣传部杨国选先生的文章（当时挂在网上，并在有关会议上宣读，还是友人在 2011 年前后告诉我的）。

关于杭州道古桥的来历是秦九韶故乡四川安岳县委宣传部杨国选部长于 2004 年考证的，他在湖州参加了全国第三届秦九韶学术研讨会后专程来杭州调研。他的文章《道古桥的寻访与考究》挂在网上多年，数学史界和数学界许多同行看到了，我看到是在 2011 年，因我在道古桥附近居住多年，自然予以关注，其时该文尚未正式发表，拙文《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又是作为科普随笔，故只是加引号而未注出处（这是我的失误）。

根据这些证词可知，2011 年蔡获悉了杨国选的调查考证。非常明显，蔡立马从中参悟出其中的绝大机遇，其头脑之敏感活泛，谋划之苦心孤诣，令人叹为观止，也令人毛骨悚然。“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对蔡来说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从此他内心里的那个魔鬼就牢牢地控制了他。从 2011 年起，蔡利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企图霸占并独享这项成果，后来的发展证明：蔡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确实将“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的发明据为己有了，十几年来蔡也确实凭借这项成果扬名立万了！

蔡谋定而后动，他的一系列行动目的清晰，环环相扣，完全当得起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为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成功运作的典型案例。

1. 蔡向杭州有关部门提议用“道古桥”去命名一座 2005 年修建的桥，见 2012 年 4 月 28 日《浙江日报》报道：“此桥由浙大教授蔡天新提议命名。”又见 2014 年 8 月 22 日《文汇报》报道：“2012 年，在蔡天新的建议下，杭州市地名办和民政局将距老桥遗址百米的一座新桥命名为道古桥。”

另一方面，杨国选《秦九韶生平考》P125 在脚注里专门注明：“2010 年 10 月，作者也向浙江省政府去信，建议将市政府新建的仿‘道古桥’石拱桥复称‘道

古桥’。”是书同页的正文记载：“2012年3月，浙江大学数学系蔡天新教授在浙江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中提出‘关于重新命名道古桥’的提案，被浙江省政府采纳。”

这里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浙江日报》《文汇报》只提到蔡建议命名一座道古桥，压根不提及杨国选比蔡早一年半就建议命名一座道古桥。《浙江日报》《文汇报》为什么同时出现同样的失误呢？一个简单明瞭的答案是：蔡要把杨国选排除在外。当然，这个问题应该只有蔡才能给出最令人信服的准确回答。

2. 请王元院士题写“道古桥”桥名，见2021年7月30日《解放日报》，蔡回答记者说：“我请数学家王元先生题写了桥名。”蔡请王先生题写“道古桥”时，王先生已经迈入耄耋之年，笔者不想猜测王先生是怎么被蔡说动的，否则是对已经仙去的长者的大不敬。笔者知道，杨国选是没有这种资源的，他甚至以为王先生就是浙江大学的一名教授。

3. 2012年4月28日，蔡积极参与“道古桥”复名立碑，见2012年4月28日《浙江日报》报道：“在道古桥新址，浙大的唐孝威院士、林正炎教授等和杭州市民政局、地名办、西湖区和灵隐街道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了‘道古桥’揭牌仪式。”在这样出头露面的场合，杨国选绝对是不会被邀请参与其中的。

4. 2013年徐雯雯和俞宁一锤定音地发文表彰蔡的功绩：“当地居民对这座石桥的历史几乎无人知晓，直到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揭开了这一段尘封的记忆。”这句话清楚地向世人传达了一条重要信息：是蔡第一个发现了“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蔡对此也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徐雯雯和俞宁只不过是《上海日报》的两名英文版记者，于情于理，他们的信息只会来自蔡，不可能来自他人。说蔡剽窃了杨国选的劳动成果，完全顺理成章，一点都不冤枉他。[4、5]没有一字提及杨国选，它们本来是蔡引以为傲的护身符，现在变成了蔡强取豪夺的铁证，蔡以实际行动为古训“祸福相依”提供了又一个生动无比的范例。

5. 前面已经说过，杨国选的下面两条史料都是不能采信의：

《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西溪桥，本府试院东。”

元《大德临安志》卷一十五：“道古桥，本府试院东，西溪河之上。”宋嘉熙年间“道古”建造，名曰“西溪桥”。

蔡在文史上不学无术，无力分辨杨国选引用史料의真假，强行把杨国选的两条史料篡改改为：

南宋咸淳初年《临安志》有载：“‘西溪桥’，本府试院东，宋代嘉熙年间道古建造。”

蔡在文章里蓄意篡改杨国选那两条错误百出的史料，这属于篡改二手史料！很明显，这不是“错记”的结果，而是刻意的剽窃行径，蔡就是想从材料出处上掩盖其剽窃行为，由此剥夺杨国选的发明权。现在蔡承认其发明剽窃自杨国选，那他早就知道杨国选的核心材料最早出自“《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只要蔡具有一个学者的最低良知，稍微懂得一点学术规范，做一点最基本的功课，粗略查阅一下《咸淳临安志》这部志书，就能够发现杨国选之非，何至于像现在这样言不由衷地说谎：“文章发表前，我去查找过有关文献，遗憾没有查到，心里惦记着，也是我写过的文章中唯一让我记挂的一件事。”蔡利令智昏，他确实希望是自己发现了秦九韶造桥啊！

6. 做足这些工作后，蔡就利用各种场所宣扬他的发明，不断强化他发现“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以及他守护道古桥的崇高形象。蔡在宣扬秦九韶造桥的功德时，从来不提杨国选的工作。他道貌岸然地招摇过市，欺骗政府，欺骗民众，祸害学林，突破了一个学人最起码的良知底线。斯人斯行，人焉？妖焉？

杨国选应该只是四川省安岳县宣传部的一个业余学者，应该没有受过多少专门的学术训练，多年来不断收集、整理乡贤秦九韶的生平事迹和民间传说，这也许是出自对秦九韶的景仰。从文化的多源性而言，只要杨国选不造谣惑众，只要杨国选的目的和出发点是善良的，杨国选的这种行为就值得尊重。在民间这种人并不少见，他们发挥的作用有时是对书斋学者的有益补充。基于这点认识，之前在朋友面前笔者对杨国选一直抱着相当宽容的态度。

本来，如果杨国选在[6]里引用的原始材料是真实可靠的，那他考定秦九韶生年、考定秦九韶在郫县任职县尉，都是严肃的学术工作。非常可惜，笔者近来已经证明[6]用来考定秦九韶生年的材料来源纯属刻意造假，这样杨国选最重要的工作“秦九韶生于1208年3月”根本不值得采信。受此启示，笔者认真地研读[3]，非常惊讶地发现：从学术上说，这本书完全背离史实，其所谓的史料几乎都是随心所欲地伪造而来，就伪造史料而言，杨国选真正做到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之前笔者从来没有听说过世上竟然存在这样的书。[3]没有任何学术价值，与秦九韶的生平毫无关联，可它的书名竟然是“秦九韶生平考”，非常令人无语。《秦九韶生平考》足以把四川大学出版社钉在耻辱柱上！

更令人无语的是，[6]的结论竟然得到了数学史专家的承认！本来，只要稍微核对[6]的核心史料（请杨国选提供原始证据即可），即所谓的乔行简“贺秦秘阁季樵得子”词，即刻可以发现杨国选的造假行为，但是，[6]顺利通过审查发表出来了！十几年来，[6]是得到了数学史界以及社会公认的。

退一步说，假设[6]是经得起考验的，那与杨国选的工作相比，蔡到底做了什么关于秦九韶的严肃研究工作呢？百度介绍，蔡竟然担任了四川省安岳县秦九韶学术研究会名誉会长，真是长袖善舞啊！

当杨国选见到蔡攫取其收集得到（亦或编造）的劳动果实“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时，心情应该充满无奈和悲凉吧，《秦九韶生平考》P₁₂₄如此记载他见到道古桥立碑之事：

2012 年秋八月，我再次到杭州考察与秦九韶关联紧密的“吴山天文台”，住在离“道古桥”不远的西湖区教工路香安酒店。晚餐之后，沿天目山路漫步，去观览那座杭州市民心中的“道古桥”。不料发现，杭州市政府仿“道古桥”复建的石拱桥桥头，竟然竖立着一块石碑，碑的正面是王元题写的“道古桥”三个大字。

蔡的操作是杨国选做梦都想不到的！蔡全然无视杨国选的劳动成果，其所作为超出了最起码的学术伦理，是赤裸裸的公然剽窃。浙江大学是国内的学术重镇，在 985 高校中名列前茅。百度介绍：浙江大学一直秉承着竺可桢校长在 1938 年确立的“求是”校训，形成了“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浙大人共同价值观和“海纳江河、启真厚德、开物前民、树我邦国”的浙大精神。果真如此，浙江大学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应该认真调查蔡的刻意剽窃行为，并给社会一个交代，把调查结果公之于众。

这里提及蔡的一件往事是非常合适的。一位华裔数学家读到[1]的初稿后，专门把蔡二十多年前的一次学术不端行为告诉笔者，它能够充分证明蔡的学术诚信早就存在污点的。2002 年 4 月中国《数学学报》（英文版）刊发了一篇文章“On the Residues of Binomial Coefficients and Their Products Modulo Prime Powers”[7]，作者署名为蔡（CAI Tian Xin）和美国数学家 GRANVILLE Andrew，2003 年 1 月该杂志在所刊文章“A Characterization of Continuous Module Homomorphisms on Random Semi-Normed Modules and Its Applications”最后一页的末尾位置登载了一则极不寻常的更正启事：GRANVILLE 否认他是文章的一名作者。兹移录此更正全文（见[8]）如下：

Erratum: GRANVILLE Andrew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GA30602, USA) is not an author of the following paper: On the Residues of Binomial Coefficients and Their Products Modulo Prime Powers, Acta Mathematica Sinica (English Series), 18(2), 277–288 (2002).

美国《数学评论》（MR1910963）在评论论文[7]时，专门添加了一个注记来强调这则更正启事：

Reviewer's remark: Granville was listed as a co-author of this paper without his permission. An erratum to this effect is being published in Acta Math. Sin. (Engl. Ser.) 19 (2003), no. 1.

一位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其人生极具传奇色彩、在学界广受尊敬的仁人君子在发给笔者的邮件里评论说：“真是一个令人难堪的更正。”一叶知秋，这句成语真是知人论世之言！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笔者收到朋友转来的一篇文章“关于《数学学报》的一则勘误”，一位署名“KF”的好事者向 GRANVILLE 询问这则勘误的究竟。在 20 多年时过境迁之后，GRANVILLE 自然表达了非常包容的态度。于情于理，“KF”的这种操作都是缘木求鱼，也是刻舟求剑。其实，要搞清事情的原委非常容易：“KF”可以直接咨询《数学学报》处理此事的经办人，调出《数学学报》的原始档案，从这份最过硬的证据找到准确答案。笔者认为这才是还原事实真相的正确途径！

三、做贼心虚

从蔡的奇文三部曲来看，他非常熟悉杨国选关于秦九韶的工作，但他就是从来不提杨国选，其目的是昭然若揭的。他精于算计，非常清楚只要提及杨国选的贡献，就会冲淡他发现秦九韶造桥的光彩，缩小他守护道古桥的形象。蔡剽窃了杨国选“辛苦”得来的劳动成果“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并依靠这项成果大行其道收获无数，其实他一直非常清楚自己守护道古桥的形象是如何得来的。2025 年 12 月 17 日，蔡在读到[1]的基本内容后，面对笔者严谨全面的考证，面对笔者异常严厉的质疑，蔡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妙，他必须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如何回应笔者对其学术造假的质疑？当然，他完全可以选择不予回应，不过这不符合他的身份和做派：他身上的多重光环太耀眼了，他也许相信自己确实是光芒万丈的，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应，并且写出了奇文（I）。蔡太高估自己了！当蔡准备作出回应时，于情于理，他只有两种选择：

其一，蔡承认自己发明的“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纯粹就是学术造假。要是这样做，蔡自估无法面对由此必然带来的涉及学术、道德、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这几乎就是一条必死无疑的绝路。

其二，蔡承认自己的“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之说来自杨国选，再强调其得意之作“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只是一篇“随笔文章”“并非学术论文”“不是考证文章，故而未注明出处”，再强调“这是我的失误”。毫无疑问，这是蔡的缓兵之计，他不过是要以此赢得喘息时间，再徐徐谋划而已。

实事求是地说，第二种选择应该比第一种高明得多。蔡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依靠秦九韶去博取名利了，于是毫不犹豫地把杨国选推出来顶锅，他从来不屑提起的杨国选就在[2]里变成了“杨老”：

而刘文也引用了杨著，故而知晓内情的他的证伪应针对尚健在的杨老，至少应提及拙文有关道古桥的来历引自杨文，而非像刘文所写那样杨文受我影响。

反常即是妖，“杨老”之称显示出蔡现在对杨国选真是尊重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蔡就是一部生动的教材，为理解不少古语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蔡急切地给《数学文化》两个主编回信以及信的内容最真实地反映了他做贼

心虚的心理。2025年12月17日，蔡写出奇文（I），开头就为自己推卸责任：

早上收到广州快递过来的文章《“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证伪》（以下简称“秦文”）一文，第一时间读完，谢谢作者提供了他的考证观点。关于道古桥及其来历，出自安岳县委宣传部杨国选先生的文章（当时挂在网上，并在有关会议上宣读，还是友人在2011年前后告诉我的）。

早上收到快递，蔡就迫不及待地写回信。蔡是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是作家，是诗人，著作等身，但他的奇文三部曲缺少最基本的写作章法，文不对题，缺乏逻辑，表达混乱，违背常识，在微博里放肆无忌，这有些违反常理，根本不像一位具有丰富写作经验的作者所为。例如[2]写道：

该文后来以《宋元两大数学家与临安道古桥》为题正式发表于杨国选著作《秦九韶生平考》，想必出版社已请人审核。

笔者只想请问蔡：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界的台柱（按照现在的分类，商务印书馆的级别应该比四川大学出版社高出很多），在国内享有盛誉，请人审核了《数学传奇》里的荒诞文章“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吗？！蔡根本不具备自省的素质和能力，只是急切地想当然地盼望能够找到理由来澄清一些东西，摆脱一些东西，只为达到一个目的：把锅直接甩给杨国选，马上能从中抽身离开。蔡本来是要努力避开杨国选的，但面对笔者铁一样的坚强证据，蔡不加思考就打出杨国选这张牌，这是他做贼心虚后下意识的本能反应，没有比这更合理的解释。从信的语气就能感觉到蔡方寸大乱，这是做了亏心事该受的报应。举头三尺有神明，苍天饶过谁！

“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纯粹就是一篇垃圾文字，无论是从人格从学风还是从学问来说，蔡都完全没有资格跟笔者进行什么“学术探讨”！就蔡的这篇文章而言，他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见解，行文粗陋，硬伤随处可见，仅凭这篇文章就足以把他置入祸害中华文化的“砖家”“叫兽”之列。是文第五部分题为“世界本原”，比第一部分更能显示蔡的无知和荒唐，蔡就是一个对中华文化一窍不通的学术骗子！秦九韶《数书九章序》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篇光辉文献，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篇典范之作，蔡竟敢随意篡改秦九韶的原文，例如蔡就把秦九韶的原文“昆仑磅礴，道本虚一，圣有大衍，微寓于《易》，奇余取策，群数皆捐，衍而究之，探隐知原”篡改为“巍巍昆仑，气势磅礴；世界本原，在于数学”，这两处文字的深浅差异一目了然，前者非常深刻地涉及中华文化里的几个重要概念：道、虚一、圣、大衍、《易》、数，后者简直俗不可耐，不堪卒读。蔡把秦九韶那些内涵丰富文辞优美思想深刻的文辞蜕变成狭隘平庸不着边际之言，诸如此例的随意篡改现象在这节文字中比比皆是，其文的第五节“世界本原”完全就是狗尾续貂。每个严肃严谨的学者都知道，要是没有坚强的证据支撑，

绝对不能随意篡改古籍里的文字，这是最基本的学术轨范。这节文字彻底暴露了蔡的浅薄无知，他就是在糟蹋中华文明，再请问蔡一句：商务印书馆请人审核了这些文字吗？！

笔者天生厌恶那些装模作样的伪君子，非常欣赏陈佩斯“我很干净”“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的访谈，素不关心什么奖励荣誉之类。文章[1]没有提及蔡那些光辉照人的获奖事迹，也许在蔡看来这是对他的大不敬，于是蔡就在其奇文（II）（III）里主动挑起其获奖的话题，笔者唯有坚决奉陪，用事实说话，绝不退缩。蔡说：

本文（原文如此）2009年出版的《难以企及的人物——数学天空的群星闪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数学传奇》初版，其时尚未撰写秦九韶等中国数学家的任何文章）已于2013年获得第6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科）成果普及奖（文科最高学术奖）。

2009年出版的拙著《难以企及的人物——数学天空的群星闪耀》（广西师大社，其时本人尚未撰写过任何中国数学家的文章，即便秦九韶一文，道古桥也远非主要内容）曾获第6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科类）优秀成果奖（文科最高学术奖）之成果普及奖。该书出版前，书中文章悉数发表于《读书》《南方周末》和《中华读书报》。换言之，本人并不需要假托道古桥沽名钓誉。

这是蔡做贼心虚的活写真！尽管笔者不懂蔡的这个“文科最高学术奖”到底意味着什么，但笔者还是知道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荣获了国家图书奖，肯定是没有得过这个“文科最高学术奖”的，笔者也知道国家准备授予黄昆先生最高科学技术奖时，黄先生觉得这个奖太大太高了，不愿意申报。经过网上搜索，蔡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8年01月0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公布了《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目录》，蔡天新和《数学传奇——那些难以企及的人物》赫然在列，编号J-204-2-05。肯定地说，“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就在蔡获奖的这本书里。现在笔者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就想问蔡一句：这本书配得上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吗？还有，不知蔡敢不敢接招回答几个问题：

1. 蔡能不能公开其申报书的全部内容？

2. 蔡在奇文（I）明确说“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是需要核查而他又一直没有核查清楚的：“文章发表前，我去查找过有关文献，遗憾没有查到，心里惦记着，也是我写过的文章中唯一让我记挂的一件事。”蔡拿一个连自己都一直半信半疑的东西去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这是一个正派知识分子能做该做的事？评选并颁发国家科技进步奖是严肃庄重的国家行动，蔡为所欲为，视国家科技进步奖为儿戏，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允许这种严重的欺诈行为存在吗？

3. 蔡已经明确承认“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之说是从杨国选处剽窃得来的，蔡拿一本含有剽窃内容的书去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允许这种明目张胆的剽窃行为存在吗？

还有，蔡《数学与人类文明》一书的封面上标明：“本教材所属课程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书里也有秦九韶修建杭州西溪桥、朱世杰将西溪桥改名为道古桥的内容。拿剽窃得来的内容荒唐经不起推敲的材料去误导学生，去申报“国家教学成果奖”，这是一个大学教师该做能做的事？！

《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在结尾处写道：

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要向王泽山院士、侯云德院士及全体获奖者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主动担当起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历史重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求真务实”是国家对每个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个严肃学者应该遵守的起码底线，请蔡扪心自问：你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行为与“求真务实”相匹配么？！

现在蔡拿“随笔文章”来搪塞世人，意图说明其《数学传奇》只是一部科普著作，可以不必遵守太严格的学术规范。这只是蔡的一厢情愿！2002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了一部法律，并在2024年12月25日进行了修订，这部法律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其“第七章”明确写明科普者应该承担的各种“法律责任”，照录第五十七条如下：

骗取科普表彰、奖励的，由授予表彰、奖励的部门或者单位撤销其所获荣誉，收回奖章、证书，追回其所获奖金等物质奖励，并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即使是一个科普作者，在学术上也绝对不能违反常识肆意妄为。[1]已经彻底揭露了“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纯属子虚乌有之事，但蔡就是死不悔改，他在奇文（I）里写道：

在另一部流传更广的拙著《数学简史》（中信出版社，2017）也提到秦九韶和道古桥，不过只用了两三行文字，且前面加了“相传”两字，以后其他文章或书籍在印时，我也会仿此修订。

2026年6月26日，四川安岳县委宣传部推出纪录片《寻路九韶——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的传奇人生》，该片严重缺乏历史材料支撑，错误百出，充满了臆想意淫。最让人无语的是，蔡和杨国选是它的学术顾问，还在贩卖“秦九韶修建杭

州道古桥”，世上竟还有如此不知悔改的无耻之人！

国家鼓励“求真务实”，浙江大学倡导“求是创新”，而蔡公然敢反其道而行，“我也会仿此修订”这句话令人触目惊心！

蔡还说什么“本人并不需要假托道古桥沽名钓誉”，这是他做贼心虚的又一典型表现，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同时，这句话明镜似地照出了他最真实的肮脏嘴脸！简单地通过网络搜寻即可发现，这些年来蔡接受各类访谈，四处讲座，“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每每被他当作标志性成就。他利用不知通过什么手段占用的公共资源去欺骗不明真相的政府和听众，例如 2021 年 10 月 18 日，他在四川省图书馆的“名人大讲堂”做讲座，题目即为“秦九韶、道古桥与中国剩余定理”。2023 年 2 月 15 日，蔡做客四川省安岳县“行走中的名人大讲堂”，演讲题目为“秦九韶：伟大的数学家和梦想家”；2025 年 9 月 21 日，蔡做客浙江图书馆，报告题目亦为“秦九韶：伟大的数学家和梦想家”，该报告被列于“文澜讲坛”第 1338 期，其宣传预告写到：“1238 年，秦九韶丁父忧回到杭州，为利民众通行，亲自设计建造了西溪桥，后被命名为“道古桥”，至今仍横跨在西溪河上。”这难道不是“假托道古桥沽名钓誉”！

按照蔡的陈述，他在 2025 年 12 月 17 日之前，还不清楚史料“‘西溪桥’，本府试院东，宋代嘉熙年间道古建造”之真伪，却在 2021 年 7 月 6 日在《赛先生》上再次发表“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并且特别注明“原创”，这难道不是“假托道古桥沽名钓誉”！进一步说，杨国选[3]已经出版于 2017 年，蔡在《赛先生》上再次发表他的荒诞文章时，仍然不提杨国选的任何贡献，这再一次坐实了蔡的剽窃行径。四川省安岳县为拍摄秦九韶的宣传片，专门来到了道古桥，饰演秦九韶的演员还特地与蔡在道古桥合影留念，2025 年 11 月 20 日，蔡在朋友圈发文“秦九韶来到道古桥”：

昨日，四川安岳县摄制组来杭州，拍摄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杭州的足迹。道古是秦九韶的字，当年他亲自设计老桥。

文字后附带放置了四张照片，其中一张是蔡与秦九韶在道古桥的合照。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假托道古桥沽名钓誉”！蔡在朋友圈留下的这条光辉记录实事求是地反映出安岳县也认为他是“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的发明人，他就是道古桥闹剧的决定性推手。蔡兴风作浪，四处传播道古桥闹剧，误导民众，诱使杭州市和四川安岳县的政府部门迈入歧途，实属学界妖孽。于今蔡要把锅甩给杨国选，真是白日做梦，比登天还难！

有朋友告诉笔者，2012 年 9 月蔡出版了《数论——从同余的观点出发》[9]，是书来自蔡的《初等数论》讲义，列高等教育出版社《现代数学基础》丛书第 30 号，其第三章第一节阐述了中国剩余定理，内中写道：

值得一提的是，秦九韶（1202 或 1208-1261）字道古，在杭州浙江大学附近的西溪路上，曾有一座桥叫道古桥，就是为了纪念这位 13 世纪的数学家。此桥由秦九韶亲自设计并筹款，后由元代数学家朱世杰（13-14 世纪）倡议命名。直到 21 世纪才被拆除，十分可惜，不过在 2012 年，经过有关人士的努力，将离原址不到百米的一座新建石桥命名为道古桥。

这难道不是“假托道古桥沽名钓誉”！从“经过有关人士的努力”能够看到，2012 年蔡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强调自己发现了“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直到 2013 年《数学文化》发表“跨越千年的数学桥”之后，他才肆无忌惮地使用其守护道古桥的形象。说实话，在大学里从事数学教学工作，要在常识上误人子弟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蔡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点。2014 年 8 月 22 日《文汇报》报道蔡守护道古桥的事迹：

听过蔡天新讲课的学生，都会记住“秦九韶”这位南宋大数学家的名字，有人甚至还会专门去杭州天目山路上的道古桥去“朝圣”。小巧精致的道古桥，是秦九韶亲自设计的，“道古”两字正是秦九韶的字号。

这还不算是荒唐的！蔡在《数论——从同余的观点出发》证明中国剩余定理之后，用“韩信点兵”作为例题，并写出了如此惊世骇俗的脚注：

这个例子说明，远在孙子之前的秦朝末年，便有了中国剩余定理的特例。

在中华文化里，“孙子”通常就是春秋时期的杰出军事家孙武。从这个脚注能够推断出蔡的三点认知：

1. 孙武是“秦朝末年”之后的人物；
2. 尽管蔡在书里写道：“《孙子算经》的作者不详，一般认为这是公元四世纪（东晋）的作品，比孙武（约公元前 535-）的《孙子兵法》要晚得多”，但这个脚注表明，蔡自己认为《孙子算经》是孙子所作；
3. “韩信点兵”是韩信的创造，远在《孙子算经》最著名的问题“物不知数”之前。

这真是逆天！蔡是一个什么人啊，笔者实在无法用言辞来刻画他了。请问：高等教育出版社请人审核了《数论——从同余的观点出发》吗？！蔡还在奇文(I)里洋洋自得地明言：2017 年他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流传更广的《数学简史》，真是奇迹啊！

蔡“沽名钓誉”并非仅仅局限在道古桥闹剧上，“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肯定不是严肃的普及工作，他也根本没有做过严肃的经得起考验的数学普及工作，却极力钻营去申请国际数学家大会数学普及奖，只是事与愿违罢了，这难道不是“假托道古桥沽名钓誉”！蔡“沽名钓誉”还体现在他那些道貌岸然充满正气的文字上。这位行事处世毫无底线令人瞠目结舌的“江南才子”（这里

借用张益唐推荐《数学传奇》使用的术语）以一副十足的教师爷口吻谴责那些在学术上的弄虚作假之徒，把《数学传奇》之“初版序言”写得义正辞严，充满了道德力量：

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名目繁多的弄虚作假，包括学术造假，有的甚至触目惊心。但在纯粹数学领域，任何创造性的工作或发现都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难以通过人为的手段掩饰或虚构的，这就把那些科学骗子或混混拒之门外。

《数学传奇》之“新版序言”在结尾处引用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话（笔者借用了蔡的术语，对詹姆斯其人其言没作考证）：

真理对思想而言无论怎样都是有用的，正如道德对行动而言无论怎样都是有用的。

对比蔡的言行，这是多么动人心魄让人无语面对的讽刺啊！透过蔡的得意之作“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笔者实在看不出他追求什么真理，也实在看不出他遵守什么学术道德，只能看出他对真理和道德根本没有敬畏之心，他只是一个十足的利欲熏心之徒而已。蔡依靠剽窃得来的荒诞之说欺骗政府欺骗民众，其时间跨度之长，受骗范围之广，博得的名声之大，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许是空前的。

以蔡浮浅的学风学养，他很可能没有阅读余嘉锡先生 1946 年的文章“南宋算学家秦九韶事迹考”，也不知道余嘉锡先生壁立千仞的著作《四库提要辨证》里关于秦九韶的考据文字。近些年来，包括蔡在内的一些人力图为秦九韶的道德污点翻案，罔顾事实发出种种可笑的呐喊，空洞而又虚假。这些人并非为了追求真知，更多是为了一己之私，其所作所为为中国文化界提供了一个恶劣标本。蔡强取豪夺，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祸害儒林，当退出学界，以此谢罪！

作者感谢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杜朝晖教授的慷慨帮助！

参考文献

- [1] 刘合国. “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证伪, 数学文化 2026(1), pp. 106-117. ([1] 可以看作是“蔡天新发明的‘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纯属自欺欺人”一文的洁本, 后者张贴在 2026 年 3 月 20 日《新语丝》上, 它们与现在这篇文章结合在一起, 应该揭示了道古桥闹剧的真相。)
- [2] 蔡天新. 关于《“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证伪》一文, 数学文化, 2026(1), pp. 118-119.
- [3] 杨国选. 秦九韶生平考,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 [4] 徐雯雯, 俞宁. 跨越千年的数学桥, 数学文化, 2013(3), pp. 79-84.
- [5] Xu Wenwen and Yu Ning. Bridge Named After the Mathematician Who Discovered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Notices of AMS., 2013(5), pp. 596-597.
- [6] 杨国选. 秦九韶生年及任县尉考,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8(4), pp. 371-375.
- [7] CAI Tian Xin, GRANVILLE Andrew, On the Residues of Binomial Coefficients and Their Products Modulo Prime Powers, Acta Math. Sin. (New Series), 2002(2), pp. 277-288.
- [8] Erratum, Acta Math.Sin. (New Series), 2003(1), pp. 208.
- [9] 蔡天新. 数论——从同余的观点出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附录 1

下面的文字是蔡写给《数学文化》两位主编的信, 现一字不改地照录在此, 供读者参考评判。需要说明的是, 蔡在奇文(II)(III)里都提到这封信, 它的本质内容已见于这两篇奇文, 公布这封信根本不会侵犯蔡的隐私之类。

汤涛、建亚主编,

早上收到广州快递过来的文章《“秦九韶修建杭州道古桥”证伪》(以下简称“秦文”)一文, 第一时间读完, 谢谢作者提供了他的考证观点。关于道古桥及其来历, 出自安岳县委宣传部杨国选先生的文章(当时挂在网上, 并在有关会议上宣读, 还是友人在2011年前后告诉我的), 我和秦九韶是数论同行, 每年都给学生讲他发明的中国剩余定理。当时已写了十多位中外数学家的故事, 宣扬他们的数学成就, 加上我住的公寓离道古桥只有一两百米, 便写作了随笔文章《秦九韶, 道古桥与〈数书九章〉》, 并非学术论文, 后来收录在相关拙著。文章发表前, 我去查找过有关文献, 遗憾没有查到, 心里惦记着, 也是我写过的文章中唯一让我记挂的一件事。杨国选的一系列考证文章后来集结成《秦九韶生平考》, 于2017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秦文”一文已有提及, 想必作者看到杨著未引用拙文, 因他才是原创者, 唯一提及本人建议杭州市政府重新命名另一座桥为道古桥, 只是当时杨文在网上, 加上拙文又不是考证文章, 故而未注明出处。

“秦文”作者旁征博引, 应该是行家, 了解他质疑文字的原出处。我注意到“秦文”也提到科学史家郭书春教授的新著《秦九韶传》(天地出版社, 2025), 想必作者也看到郭先生肯定了杨国选有关秦九韶的生平考证, 称赞杨国选同志是有贡献的。

另一方面，像秦九韶这样有历史“污点”的人，当年便在反对他和吴潜的人势力操控之行贬谪广东梅州，如果他造了道古桥（据杨国选考证，他还曾设计了宁波的高桥），也不大可能把造桥功绩记录在他名下吧？

又，在另一部流传更广的拙著《数学简史》（中信出版社，2017）也提到秦九韶和道古桥，不过只用了两三行文字，且前面加了“相传”两字，以后其他文章或书籍在印时，我也会仿此修订。

蔡天新，2025 年 12 月 17 日，杭州

附录 2

柳宗元的寓言小说《蝜蝂传》载在《柳河东集·传》，现照录于此，供有心人参考借鉴：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蹶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蹶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